

文史哲研究丛刊

“高邮王氏四种”汉语语义学研究

彭 慧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史哲研究丛刊

“高邮王氏四种”汉语语义学研究

彭 慧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邮王氏四种”汉语语义学研究 / 彭慧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6
(文史哲研究丛刊)
ISBN 978-7-5325-7258-8

I. ①高… II. ①彭… III. ①汉语—语义学—研究
IV. ①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0942 号

文史哲研究丛刊

“高邮王氏四种”汉语语义学研究

彭 慧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320,000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100

ISBN 978-7-5325-7258-8

H · 114 定价: 4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王氏父子与“高邮王氏四种”	3
第二节 “高邮王氏四种”研究现状	18
第三节 本书的缘起和研究目的	27
第二章 “形、音、义互求”的汉语言文字系统观	33
第一节 形、音、义关系反思 ——论汉语与汉字的对立与统一	33
第二节 即“音”求“义”，系联词源	45
第三节 即“音”求“义”，发明通假	71
第四节 即“音”求“义”，阐释连绵词	109
第五节 综合“形”、“义”，辨识音读	141
第六节 分析“音”、“义”，证发文字	155
第三章 “引申触类”的汉语语义联系统观	169
第一节 以此证彼，辨察词义的本旨	169
第二节 沟通系联，探讨词义的引申	202
第三节 融会贯通，揭举词义的同化	236
第四节 援俚入古，阐明词义的传承	268

第四章 “揆之本文而协”的汉语语境互动观·····	292
第一节 语境理论的提出与传统训诂学中的 语境观念·····	292
第二节 上下文互证,还原字词的本真 ·····	298
第三节 前后互照,辨析同义词词义的显现 ·····	350
第五章 余论·····	372
参考文献·····	378
后记·····	403

第一章 绪 论

我国传统训诂学发端于先秦,形成于两汉,魏晋以至隋唐获得了充分发展,而及至宋元则稍有革新并出现短暂衰退。有清一代,朴学发展蔚然成风,一度衰落的训诂学经过几代学者前仆后继的努力得到全面复兴,在古籍整理和专书研究方面都达到空前的境界,成为训诂学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加之文人士志存匡复,明末清初,在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的引导下,清代朴学在与宋明理学的对立与斗争中发展起来。清儒标榜“汉学”,宣扬“经世致用、学用结合”,反对宋明理学“凿空、虚妄”的学风,逐渐形成了以名物训诂为特色,以朴实无华、实事求是为特征的治学旨趣。他们钩稽索隐、重视实证,尤其注重于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在治学方法上则大多秉承“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①的宗旨,由语言文字入手,疏通文字、辨别真伪、校勘谬误、审定文献,进而诠释典章制度、考证地理沿革,逐渐发展成为以考据为主要内容特征的学术流派。

这些学派在乾隆、嘉庆年间最为活跃,名家辈出、硕果累累,因而被称为“乾嘉学派”。他们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对古代典籍的系

^① 顾炎武《答李子德书》,《顾亭林诗文集》,《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08页。

统整理和传统文化的全面总结,从而使得中国数千年来包括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在内的许多专门绝学得到发掘和彰显”^①。这一时期,既有以考据为中心的吴派和皖派,也有以治史为主兼及治经的浙东学派,还有以治《公羊》名世、与考据学对峙的常州学派。其中,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在学术界处于领导地位,成就最大、名家最多。不过,二者在治学方法上又不尽相同^②:惠栋重视声音训诂,提倡由小学训诂上溯义理,但同时又独尊汉儒、唯汉儒是举,显得泥古不化、缺乏创新精神。他们“以博闻强记为入门,以尊古守家法为究竟”^③,然而“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的古,其短亦在于泥古”^④;戴震继承了顾炎武的音韵训诂之学和方法,把语言文字与经学结合起来,以文字为始基,通过语言的考证,达到通经明道的目的。他主张“考古宜心平,凡论一事,勿以人之见蔽我,勿以我之见自蔽”^⑤,从而纠正了汉儒学而不思、宋儒思而不学的偏颇,把“学”与“思”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了疑古不妄、信古有征、实事求是。总之,如果说惠栋标榜汉学与宋学分庭抗礼,其学尚博杂不精的话,到了戴震,则与宋学彻底划清界限,使清学得以完全独立,并支配了学术界。因而,在学术成就上,皖派超越了吴派,它的出现是清代汉学达到鼎盛的标志。

作为清代学术的灵魂和旗帜,皖派学者将汉儒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宋儒疑古创新的精神结合起来,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并力所能及地阐发了有关训诂的原理、条例、方法等,以精湛的学

① 黄爱平《乾嘉学案:高扬汉学的旗帜》,《光明日报》,2007年9月30日。

② 有关吴派与皖派在治学风格上的差异主要参考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第45—61页;李建国《汉语训诂学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233—240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第46页。

④ 永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九,经部,春秋类四,《左传补注》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第242页。

⑤ 戴震《答段若膺论韵》,《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76页。

术和丰富的著述开辟了朴学研究的新境界。刘师培曾在《近代汉学变迁论》中称：“江戴之学，兴于徽歙，所学长于比勘，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悉以心得为凭。且观其治学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条，使纲举目张，同条共贯，可谓无信不征矣。”^①

其中，段玉裁与王念孙堪称乾嘉之学的中流砥柱，他们师承戴震，充分继承了戴氏“训诂音声，相为表里”的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恢宏，提出“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及“训诂之旨，本于声音”的主张，使传统语言学在此时获得长足发展，取得了超越汉唐的成就。王念孙之子王引之幼承父教、秉承家学，与其父治学思想一脉相承。父子二人继往开来、治学专精，以声音通训诂，探讨语言内部规律并发明文辞条例之学，在音韵、训诂及语法方面取得了卓绝千古的成就，受到海内学者的一致赞誉，世称“高邮二王”。二王著述等身，其中尤以《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四书最为显著，可谓是清代训诂学发展水平的最佳诠释，世称“高邮王氏四种”。

第一节 王氏父子与“高邮王氏四种”

一、王氏父子生平事迹^②

王念孙，字怀祖，号石臞，江苏高邮人，生于清乾隆九年（1744），卒于道光十二年（1832），终年八十九岁。王氏出身书香世

^① 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541页。

^② 本小节内容主要参考刘盼遂辑《清王石渠先生念孙年谱》，《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二十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吉常宏、王佩增编《中国古代语言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516—530页，第565—577页；濮之珍主编《中国历代语言学家评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12—320页，第340—349页。

家，祖父曾录，字西受，号古堂先生，雍正癸卯选拔贡生，一生以讲学为业，学者从游甚众，父安国，雍正朝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学有经法，强力不惑”。祖父古堂先生年过七十，望孙甚切，因而为之取名念孙，因生而清臞，故自号石臞。由于深厚的家学渊源，王念孙从小就受到极好的传统文化熏陶和教育，四岁“能读《尚书》，矢口成诵。每读皆文肃公口授，无虑百数十行，俄顷皆已烂熟，一时都下有神童之目”^①，八岁能属文，十岁便读完了“十三经”，并旁涉史鉴。十二岁时，父亲为他延请留寓京师的学者戴震作老师，其间他曾与段玉裁结为相知，共同学习音韵、文字、训诂之学，并自此确定了“考文字，辨音声”的治学方向。

乾隆二十二年(1757)，父亲王安国病逝，王念孙扶柩柩而返高邮，居家读书。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皇帝南巡江南，王念孙以大臣的后代前去迎接銮驾，并献诗赋，被赐为举人。王念孙多次进京会试不中，直到三十二岁即乾隆四十年(1775)才考上进士，赐二甲七名进士出身，授庶吉士。尔后四年，他返家居于家祠畔之湖滨精舍，谢绝人事，潜心读书。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入京都，到翰林院供职，参加了四库全书馆的工作，后又作了几任监察御史，传世巨作《广雅疏证》主要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嘉庆四年(1799)，乾隆皇帝死后，嘉庆帝即位，他曾密疏弹劾大学士和珅，使这位不可一世的人物受到制裁，当时朝野上下震动，誉其为“朝阳鸣凤”。是年又出任直隶永定河道，从事多年水利工作。嘉庆十五年(1810)，永定河河水暴涨，曾受到处罚。其间，他曾写了大量读书笔记，这便是《读书杂志》。王念孙不仅精通小学经史，而且精熟水利知识，著《导河议》上下篇，又奉旨编纂《河源纪略》，对河源所出误说力加辩证。嘉庆十六年(1811)以后，他随子引之居家，专事著

^① 王引之《石臞府君行状》，罗振玉辑《王氏六叶传状碑志集》卷四，《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6页。

述,直到逝世。

王引之,字伯申,号曼卿,王念孙的长子,生于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于道光十四年(1834),终年六十九岁。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八岁的王引之开始进入国子监学习,乾隆五十一年(1786),因乡试未中而返回高邮老家,其间曾认真研习了《尔雅》、《方言》、《说文》、《音学五书》等书。乾隆五十四年(1789),引之重返北京,随从卢荫溥(字南石)学习儒家经典,并完成著名的《春秋名字解诂》二卷。父亲发现他学问大有长进,并教之以古韵二十一部分合的道理、《说文》谐声的条例、《尔雅》、《方言》等汉代经师训诂的原则。在《广雅疏证》的编写过程中,引之的也不时参与其中,书中“长子引之曰”、“引之曰”之类的话语便缘此而来,另外,《广雅·释草》以下的疏证也是由其独自完成的。

乾隆六十年(1795),三十岁的王引之通过了乡试。嘉庆二年(1797),他把平日里听到的父亲谈论群经的意见连同自己的心得体会编纂成书,完成《经义述闻》三十二卷。次年,他又将自己研究经典虚词的成果加以汇总,编成《经传释词》十卷。嘉庆四年(1799),引之以一甲三名进士及第,从此跻身翰林院,初任编修。嘉庆八年(1803),王引之在大考中获得了第一等,被升为翰林院侍讲。嘉庆十七年(1812)五月,他出任通政司副使,离开了翰林院。此后,他又相继担任左仆寺卿、大理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礼部左侍郎等官职。其中,在担任礼部左侍郎期间,因为处理了福建龙溪县藩司李赓芸自杀一案,王引之官声大振。

然而,擅长经义的王引之,并不懂得宦海沉浮的生存之道,嘉庆二十三年(1818)十一月,王引之出任浙江乡试正考官,因率众恳请嘉庆帝,为原侍郎钱樾入祀乡贤祠,而降二级留任。嘉庆二十七年(1822)七月,因在其进呈的《爵秩全览》一书中发现缮写错误,他又被“下部议处”。道光七年(1827)七月,王引之升工部尚书、武英殿总裁官,并于次月开始奉旨校勘《康熙字典》,三年后,校刻完毕,

辑为《字典考证》十二卷，呈送道光帝钦定。道光十二年(1832)，父亲王念孙以八十九岁高龄寿终，王引之奉父柩南归，道光十四年(1834)，六十九岁的王引之服阙入都，重新担任工部尚书一职，但于是年十一月便逝世了，谥号文简。

二、王氏父子纯正朴实的学风

王氏父子毕生以读书为乐，以著述为常，以有涯之生求无涯之知。除《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外，尚有《康熙字典考证》、《释大》、《方言疏证》二卷、《方言疏证补》一卷、《〈说文解字〉校勘记》、《说文段注签记》、《说文古韵谱》、《群经字类》、《古韵谱》等。综其大略，父子二人平生所著约近百种，内容涉及语言文字、政治、教育、伦理、历法、水利等多个方面。纵观王氏父子的生平，寻绎其著述的理念宗旨，我们不难看到，与其勤政、清廉、严正、淡泊的为官之道及平和、耿介、率直、节俭的人格品行相一致，父子二人有着纯正、朴实、严谨、求真的治学风格。根据舒怀先生的总结，其学风的纯正、朴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1. 崇尚学术，淡于名利。受家庭和社会的学术风尚的影响，加之自身恬淡、宁静的性情使然，王氏父子不依赖先人的福荫，不汲汲营求官位的升迁，而是始终视读书治学为人生第一要务，不为权势所迫，亦不为名利所诱。王念孙独居于高邮湖滨精舍，全身心致力于读书著述长达五年之久，入京后，“僦居京邸，屏绝人事，键户日手一编，探赜索隐，观其会通”^②，供职以后，“三任河道，官事有假，仍从事于校讎；迨就养京邸，年臻耄耋，犹目览手记，孜孜不已。尝笑而

^① 关于王氏父子治学之风的五点概括，主要参考舒怀《高邮王氏父子学术初探》第二章，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1—46页。

^② 刘盼遂辑《清王石渠念孙先生年谱》乾隆四十五年条下，《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二十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0页。

言曰：‘人生各有所乐兮，余独著述以为常。’^①王引之继承父亲的衣钵，在操持政务、为民谋利的同时，还抢占闲暇勤奋治学，一生笔耕不辍，直至逝世前不足一月才中止下来。与此同时，他们崇尚学术的思想作风也表现在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上。对于一字一音，二人从不妄自评判、遽下结论，都要反复寻绎稽考，一再斟酌商榷，力求圆通淹贯，以求不诬古人、不误来者。

2. 讲求真理，反对盲从。乾嘉时代，吴派崇尚汉学但却固守汉学壁垒，皖派则兼取汉、宋之长，既实事求是，又不专主一家。王氏父子为皖派戴震后学，他们反对空谈、崇尚务实，重事实、重考据，且破除门户、不执一见，真正到达了所谓“斟酌古今，不专主一家言，义有可取，虽迥言必察，若与经文违戾，虽儒先训诂，亦不曲为附和”^②的境界。例如，戴震是王念孙的业师，对其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王氏在著述中亦屡屡称道师说，但在《经义述闻》中，父子二人也曾多次就戴氏《诗考正》、《东原文集》中的疏失加以更正。又如，段玉裁与王念孙同师戴震，二人交游甚密、友情甚笃，但对段氏《说文注》、《六书音均表》及其他古书注释中的失误，王氏亦不予苟同。因此，梁启超曾将王氏父子喻为毛亨、郑玄、贾逵、马融、服虔、杜预、高诱等人的诤臣，而非其将顺之臣，“夫岂惟不将顺古人，虽其父师，亦不苟同”^③。

3. 求真求新，作而不述。由汉至清，中国古代儒士大多践行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宗旨，王念孙反对这种保守的态度，认为治学当以昌明学术、嘉惠后人为目的，因而一生著述羞于与人雷同，力求达到“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

① 王引之《石臞府君行状》，罗振玉辑《王氏六叶传状碑志集》卷四，《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6页。

② 钱大昕《虞东学诗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69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第64页。

后为之”^①。在作《广雅疏证》之前，他曾有意注释《说文》、《尔雅》、《方言》，其中，王氏虽然已作《说文考证》二卷、《读说文记》一卷，但因后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便不再续作；因戴震《方言疏证》成书在前，且体大思精，虽曾有意加以补正，但又旋即中止；因邵晋涵《尔雅正义》已刊刻在先，且郝懿行拟作《尔雅义疏》，遂放弃注释《尔雅》而改疏《广雅》。对此，梁启超便曾有过犀利的评判，他说：“以石隳的身份，本该疏《尔雅》才配得上，因为邵疏在前，耻于蹈袭，所以走偏锋，便宜了张稚让。”^②刘盼遂先生更以刘备入蜀加以生动比喻，称：“石渠之疏《广雅》，如刘先主之帝巴蜀。诚以中原无用武之地，故逊入险阻而辟夷行，卒之政理民和，极荡荡便便之致。持以校夫驰骋平原康衢者，其成功之难易，诂不远哉！”^③同样，如《经传释词·自序》中言，王引之解释文言虚词也坚持以“前人所未及者补之，误解者正之，其易晓者则略而不论”的标准，不求大而全，只求真而新，力图以新的方法、新的结论给人以新的启示。

4. 实事求是，言必有据。汉儒以实事求是为本，疏通字词、阐发经义。及至宋代，受理学家主观唯心思想的影响，学者们强经就我、妄逞胸臆，乃至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明末清初，顾炎武高举“经学即理学”的旗帜，提出“经世致用”的主张，猛烈抨击宋明理学的凿空之弊、空疏之风，由此确立了重树汉学、实事求是的榜样。王氏父子继承并发扬了朴学传统，在著书立说的过程中坚持贯彻实事求是、信而有征的科学准则，他们每立一说，都要“参知他经，证以成训”，论据丰富而有力，使其“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从《读书杂志》、《经义述闻》每条疏解下有关词义的申明、旧

① 顾炎武《与人书十七》，《顾亭林诗文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35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3页。

③ 刘盼遂辑《清王石渠先生念孙年谱》，《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二十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3页。

说的指正中,我们便可深切领会到这一点。此外,王氏父子在疏解词义时十分注重实际调查与目验,例如《广雅疏证》中便大量记录了王念孙对于名物亲自口尝目验的情形,这种实证方法也充分体现了他们不诬古人、不误后学、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5. 文辞简朴,不枝不蔓。王引之曾说:“吾著书不喜放一辞。每一事,就本事说之,栗然止,不溢一辞。”^①短短的话语却道出了父子二人简洁质朴、干脆利落的语言风格。通观《读书杂志》与《经义述闻》,可以看到,每一条札记都自成一体,是一篇短小精悍的论文,篇篇条分缕析,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没有一字的冗赘或欠缺。另外,令人称道的是,在对前人疏漏加以辩驳时,父子二人词气谦恭、无过激之词,至多不过是以“失之迂”、“失之甚”、“不词”、“非也”、“谬也”之类的言语加以评判。

三、“高邮王氏四种”概述

(一)《广雅疏证》

《广雅疏证》是对《广雅》的疏解和补正,在书前《自序》中,王念孙大力推举《广雅》,认为该书“周秦两汉古义之存者,可据以证其得失,其散逸不传者,可藉以窥其端绪,则其书之为功于诂训也大矣”。然而,由于取材范围过宽,以致研究难度较大,所以自隋迄清,关注《广雅》的人一直较少。清代学者桂馥曾将研究《广雅》与研究《尔雅》相对比,并将研究《广雅》的困难概括为三点:

然治《广雅》难于《尔雅》。《尔雅》主释经,多正训,《广雅》博及群书,多异义,一;《尔雅》有孙、郭诸旧说,《广雅》惟曹音,

^① 龚自珍《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48页。

二;《尔雅》为训诂家征引,兼有陆氏释文,《广雅》散见者少,无善本可据,三也。^①

乾嘉时期,音学兴盛,传统语言文字之学得到长足发展,《广雅》也随之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主要以钱大昭、卢文弨、王念孙为代表。钱大昭著《广雅义疏》二十卷,桂馥曾叹其精审,认为可与邵晋涵的《尔雅正义》相媲美,现已被徐复先生收入《广雅诂林》。卢氏之书尚未成稿,由于缺乏史料的详细记载,具体著述情况不得而知。真正能够广泛流传,并给后世带来深远影响的惟有王念孙的《广雅疏证》。

王氏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开始为《广雅》作疏,他严定程限,“日以三字为率,寒暑无间,十年而成书”^②,至乾隆六十年终于完成此书(卷十由长子引之代作)。在书前《自序》中,王氏明确阐述了自己笺注《广雅》的思想准则:

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昧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

本着这一主旨,王氏广泛收集秦汉故训,详加考证,以形音义互求的语言整体观和贯通古今的语言历史观对《广雅》展开全面探讨。

^① 桂馥《〈广雅义疏〉序》,徐复主编《广雅诂林》附录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08页。

^② 王引之《石臞府君行状》,罗振玉辑《王氏六叶传状碑志集》卷四,《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6页。

首先，他对《广雅》进行了精校细审。《广雅》向无善本，久经误抄、妄改、散佚，讹文脱字比比皆是，王念孙广罗众本、旁考诸书，订正讹误、弥补缺漏，为人们研究《广雅》提供了可信的底本。其中，共校正讹字 580 处，脱文 490 处，衍文 39 处，错简 123 处，正文误入音内者 19 处，音内字误入正文者 57 处，其用力之勤、深思之微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他又对所涉群籍的文字情况予以考核审订，使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迎刃而解。

其次，他对《广雅》进行全面疏解，对涉及的各种字词问题予以深入分析，探求汉语言文字系统内部“至嘖不乱”的规律。这是全书的重点，也是王氏用力最勤的部分，它广泛涉及文字、语音、语义、词源等各个方面。其中，既有对《广雅》以及其他经传子史用字假借的阐明，也有对名物典章制度命名之由的探寻，既有对曹宪注音失误的指正，也有对《广雅》释义本末的审察。

（二）《读书杂志》

《读书杂志》是王念孙继《广雅疏证》之后写成的一部校读古籍的专著，是其生平读书札记日积月累的结果，也是其发明古义的倾力之作。有清一代，文献典籍的整理工作登峰造极，学者们在古书疑义的考释方面取得了不朽成就。王氏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逐渐积累起丰富的释义经验，并将这些经验方法合理应用于对古书疑义的考察中。《读书杂志》共八十二卷（余编二卷），近 70 万字，著述范围博及史部之《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子部之《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淮南子》、《法言》，集部之《楚辞》、《文选》，共十七部先秦至中古的重要典籍，此外还包含研究汉代碑文材料的《汉隶拾遗》一种^①，共计

^① 《读书杂志》在嘉庆十七年（1812）至道光十一年（1831）陆续刊行，共八十二卷，这些在王念孙生前就刊印了。道光十二年，王引之根据王念孙遗稿整理出《读书杂志余编》二卷附于书后，上卷涉及《后汉书》、《老子》、《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法言》六书，下卷涉及《楚辞》、《文选》二书。

5065 条。

与《广雅疏证》不同,该书重在勘正群籍、疏通古义。王念孙钩沉索隐,利用不同版本、征引大量文献,“于古义之晦,于钞之误写,校之妄改,皆一一正之”^①,对群书原文以及相关注释加以是正,发前代之谬、解千古之疑,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古书原貌。例如,《淮南子》是王氏用力最勤的一部古籍,他前后用各种不同的本子对校了多次,并根据义理加以推寻演绎,最终汇集成 64 条校释结论,使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涣然冰释。对此,清代经史学家陈倬在为庄逵吉刻本《淮南子》作跋时便倍加赞誉,指出:

高邮王氏《读书杂志》精确不磨,于《淮南》尤邃密,盖以道藏本为主,参以群书所引,订正凡九百余条,末又附以元和顾氏参校宋本与藏本之不同及顾氏所订诸条,盖至是而搜剔靡遗,洵为《淮南》之善本矣。^②

后来,吴承仕亦曾明言“清儒治淮南书者,以高邮王氏为最”^③。在校释古书的具体过程中,他还系统分析了古籍之所以出现错讹的原因,将其归结为传写讹脱和凭意妄改两大类,凡此种种堪称精善,为后世的古籍整理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可谓前无古人、后难为继。

与之同时,他继续发扬“音义相生”的训诂思想和触类旁通的治学方法,充分利用自己音韵、文字、语法、词气等各方面的知识储备,对群籍中的疑难字词加以疏通解释,其中既有对前人释义的质

^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儒林二·王念孙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3212页。

^② 陈倬《淮南子二十一卷庄逵吉刻本陈倬培之跋》,何宁《淮南子集释》附录四“各本序跋”,中华书局,1998年,第1527页。

^③ 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序》,何宁《淮南子集释》附录四“各本序跋”,中华书局,1998年,第1552页。